

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之塑造

吳文星

一、前言

由於社會分工，社會階層的存在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也是無法避免的。學者曾以圖形表示各種型態的社會結構，略分為金字塔型、重疊狀類金字塔型、稜型及類稜型等四種（註一）。然而無論那一類型，位居上層而控有較大權勢的總是占少數。近代西方社會學家大多以 "Elite" 一字稱呼這些位居社會上層的少數人。該字最早見於十七世紀，原是指品質特別優良的商品，其後涵義逐漸轉化和擴大，亦用以指經過挑選的軍隊或貴族等優秀的團體。據牛津大字典載，一八二三年以後，"Elite" 係指人群中的精華名流，其最初的意義完全失去。我國學者對該字的譯名不一，常見的有領導階層、精英、優秀分子、秀異分子、英才、才俊等，不一而足。本文試以「領導階層」稱之。

政治學者討論領導階層，每強調其權力，例如柏烈圖 (Pareto) 認為金字塔型的社會不過是領導階層 (elite) 與非領導階層 (non-elite) 之別，前者位居上層，其中又分為當權領導階層 (governing-elite) 及不當權領導階層 (non-governing-elite) (註二)。然而近代專業化興起之後，社會分工日趨細密，社會結構日益複雜，功能領導階層 (functional elite) 的重要性日見突出，誠如帕森斯 (Parsons) 所言，各行各業都有領導階層，政治的、文化的、學術的等等，如果不是他們出而領導，社會的運作就要大打折扣（註三）。費爾德 (Field) 討論領導階層，亦表示所謂領導階層係指在政府、政黨、軍隊、生產事業、各種職業公會、宗教團體及各種有組織的抗議團體等公、私官僚組織中，位居重要地位的人（註四）。有鑑於此，本文擬採功能領導階層觀點，作為探討的依據。

領導階層如依其地位高下、影響力大小及所扮演角色等不同，可有「全國性領導階層」(national elite) 與「地方性領導階層」(local elite)、或「領導階層」(elite) 與「次級領導階層」(sub-elite) 等之分別。本文係地區性研究，故討論對象自以「地方性領導階層」或「次級領導階層」為主，國人習稱之為「社會領導階層」。具體而言，這些人在清代係指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在日據時期則是指在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等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當時出版的人名錄是本文討論的主要依據，其中對象僅限於台灣人，日本人暫不列入討論。

研究領導階層的產生，社會階級、教育、種族、性別及地域等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然而無可否認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條件，尤以政治領導階層為然，蓋社會階級、種族、性別及地域等之影響政治地位，直接間接均透過教育。據學者研究指出，近代西方社會領導階層變遷最顯著的特徵乃是教育背景日益重要，大學畢業成為政、經領導階層普遍具有的條件，此一趨勢在近數十年正加速進行，無怪乎學者喊出：「學校漸取代家庭成為躋身高階層的通道。」(註五) 例如西方國家的國會議員及高級官員絕大多數或全部(59—100%)是大學畢業。開發中國家亦是如此，印度即有四分之三的國會議員和十分之九的閣員是大學畢業(註六)。Keller 討論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階層化，亦表示「正規教育是進入高層(政治)圈唯一最重要的門徑。」(註七)

教育除了對政治領導階層有如上舉足輕重的影響外，其他軍事、經濟及文化等方面的領導階層之產生，亦莫不以教育為主要的決定因素，蓋在日益專業化的近代社會，教育提供專業知識和訓練，具備專業知識及技術的人往往成為各行各業的領導階層。而在教育部門中，高等教育常是培養領導階層的搖籃，學者習稱為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

在傳統中國，教育成就與領導階層之間即已存在極其密切的關係，科舉功名固然是成為領導階層的主要憑藉，然而教育是科舉的準備，士紳家庭為維護其特權和地位，必須重視子弟的教育，地主或商人積聚相當的財富之後，莫不鼓勵子弟向學應舉，以求轉變其身分和地位，連下階層家庭子弟亦盡可能追求良好教育。要之，社會各階層普遍相信科舉是政府掄才合理的方式，教育則是上昇流動適當的途徑。所不同於今日者，在於教育結構和內容，亦即是傳統教育欠缺系統完整的體制和培養各種專業人才的課程及教材。台灣雖地處海外邊陲，然當清中葉逐漸由移民社會發展成為文治社會後，上述追求科舉功名及重視教育的社會價值取向，與內地並無二致(註八)。

清季由於一再受到外壓的屈辱，爲應付變局、救亡圖存，二十世紀初年，乃有制度化的西式新教育之應運而生，從此，在國內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逐漸地取代傳統士紳，成爲近代中國的社會領導階層。關於新式教育如何培養新領導階層，新、舊領導階層的遞嬗過程、取代大勢及意識形態之轉變，以及清末民初政治領導階層之結構等問題，已有學者專文討論（註九）。

台灣西式新教育制度肇始於日據時期，因係異族的殖民政權所建立，故無論是教育政策、制度、機會，甚或教育品質均具特殊性。在此一制度下，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究竟如何塑造？其家庭背景有何特色？以及新、舊領導階層的取代過程究竟如何？在在均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俾有助於瞭解近代台灣社會的變遷。

二、殖民統治下之精英教育

綜觀日據全期，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是以漸進原則，採逐步強化的同化主義方針，而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之運用實爲其主要特徵。一九一九年台灣教育令頒布之前，乃所謂台灣教育的試驗時期（註一〇），總督府迄未建立完整的學制系統。在順應現實需要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下（註一一），建立以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爲主的新式教育，而以中、上階層子弟爲勸誘入學的主要對象，並不急於普及於一般平民子弟。因此，一九〇〇年，學務課長木村匡站在統一主義的立場，曾主張台灣的初等教育應實施與日本國內一致的義務教育。結果不爲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所採納，木村旋因此去職（註一二）。一九〇三—一九一〇年，持地六三郎擔任學務課長期間，木村再度提出義務教育之議（註一三），然而持地仍以時機尚未成熟，加以反對（註一四）。

持地曾明白表示，台灣「普通教育之目標在於教育中、上階層子弟，因此，台灣的普通教育雖然稱爲『普通教育』，事實上，應該稱之爲『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今日，雖然（台灣）學齡兒童的就學率未超過一〇%，不過，關於教育設施我們必須考慮我們想要收獲的是什麼。……」（註一五）一九〇八年之際，曾是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的伊澤修二檢討台灣教育之成效，亦強調「雖然內地（指日本）實施義務教育制度，惟台灣則無此必要，盡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家庭之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註一六）總督府當局及一些日本殖民學者考察列強殖民地的情況之後，更加深信上述初等教育爲主並緩慢擴張的政

策是明智之舉，蓋受過英國教育的印度失業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反英思想，使總督府當局不得不引以為鑑（註一七）。持地認為雖然印度的叛亂有其更基本的原因，惟受過英國教育的知識分子與反英的政治活動之間實具有密切的關係（註一八）。竹越與三郎亦指出由美國統治菲律賓顯示教育殖民地人民是危險的，蓋受過教育的土著已日漸與統治當局有所磨擦（註一九）。

據資料顯示，在上述教育政策下，公學校擴充甚緩，入學率長期均甚低，直至一九一五年度仍不及一〇%（只占九·六%），加以在學中異動甚大，中途退學者，一九一一年度以前平均高達三分之一，其後雖逐年下降，至一九一八年度仍占八分之一（註二〇）。若累計一八九九—一九一八年度之公學校畢業生，計有五三、四〇一人，只占一九一九年台胞總數三、五三八、六八一人的一·五一%（註二一）。無怪乎持地稱台灣的初等教育為精英教育。據基督長老教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觀察，當時公學校畢業生即可在殖民政府中找到雇員及譯員的工作（註二二）。

此一時期，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僅先後設立修業三、四年的國語學校（案：「國語」即日語之意，因係機關名稱，故襲用原名，下同），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及公私業務人才；修業五年的醫學校，以造就醫事人才；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農事試驗場及糖業講習所，以及修業三年的工業講習所等，作為職業教育機關，以訓練低級技術人員。其中，醫學校及國語學校為當時台胞的最高學府，惟只有醫學校勉強稱得上為高等教育機關。論者指出總督府僅有限度擴充公學校，並盡可能防止台胞產生接受較高的教育、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及較好的就業機會等需求，只希望公學校畢業生仍追隨其父兄務農或經商，或成為新工業的半技術工人，只有少數較為優秀的方鼓勵其投考國語學校師範部或醫學校，教師及醫師遂成為少數台胞得以合法尋求上昇流動的兩個主要安全瓣（註二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因應民族自決之時代思潮、日本帝國主義之昂揚及民主運動之盛行，以及台胞民族自覺所造成的新威脅等內外危機，不得不「改革」台灣統治方針，以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因此，一九一九年總督府明揭同化主義施政方針，根據差別原則，頒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灣人的教育制度。在公學校之上的教育機關計有四年制高等普通學校一所、三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兩所、五年制師範學校兩所、三年制工業、商業及農林學校各一所、六年制（預科三年、本科三年）農林及商業專門學校各一所、八年制（預科四年、本科四年）醫學專門學校一所等。由上顯示，教育制度着重中等職業教育，同時，雖然

大致建立台灣人的教育體制，教育機會仍頗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註二四）。其中就較重要的師範教育及高等教育而言，時人已明加批判，指出師範學校只相當日本國內師範學校三、四年級程度，專門學校只相當日本國內甲種實業學校程度，而醫學專門學校亦較日本國內醫專程度低（註二五）。論者指出此一特殊的教育制度並不準備讓學生接受專科或大學教育，而在於期將台灣人納入工、商部門急激成長的殖民經濟中，使技術勞工不必再完全仰給於日本（註二六）。

上述教育制度當然無法滿足台胞長期以來的教育要求，甚至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而紛加指摘。故總督府旋標榜「內地延長主義」，強調將以普及教育提高台灣文化為首務（註二七）。一九二二年，復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共學。此後，台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於是除在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等之外，另創立七年制高等學校（大學預備教育機關）一所，原各實業專門學校改制為三年制高等農林、商業及工業學校，以及四年制醫學專門學校，專收中學畢業生，並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表面上，從此台胞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惟實際上只是為迅速成長的在台日人子弟提供更多教育機會，台胞子弟並未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故能進入較高教育機關的人數反而日減。矢內原忠雄曾客觀地批評共學徒具虛名，略謂：

「這些結果，當然是高等教育機關大部分為日籍學生所占有，名為教育制度之同化，其實等於是剝奪台灣人接受高等專門教育。一九二二年以前，係藉降低台灣人之教育程度，使日本人取得領導者與支配者之地位，現在則制度上名為平等，台灣人亦可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却是多方限制，使更得確保日本人之支配地位。」（註二八）

即使是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後，在台推動「皇民化教育」，實施義務教育，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專科程度，惟差別待遇依舊，中等以上教育機會始終未公平開放。職是之故，台胞的中等以上學校入學競爭長期均十分激烈，例如一九二二—一九四〇年，中學校（男子）之錄取率，台籍生平均為一五·九%，日籍生為五一·五%，師範學校公學師範普通科之錄取率，台籍生平均為五·一%，日籍生為二四·二%，入學難易懸殊，判若雲泥，至為明顯（註二九）。就畢業生人數觀之，據一九四三年度『台灣學事一覽』統計，迄至一九四二年度，中學畢業生計有台籍男八、四三〇人、女八、八三四人（內含山胞男、女各四

人），日籍男一〇、六三一人、女二〇、二八九人。職業學校畢業生（不含二、三年制職業補習學校）計有台籍男六、〇六一人（內含山胞二一人）、日籍男五、六七五人。一九四三年台胞總數為六百餘萬人，足見受過中等教育之台胞所占比例之微少。據此，當時的中等教育已足可稱之為台灣人的「精英教育」。至於一九一九年以前作為台胞子弟僅有的兩所最高學府——醫學校和國語學校，隨著學制的改革而改為醫學專門學校和師範學校，以及一九一九年以後增設的各種高等教育機關，台胞子弟入學更是不易，而為最優秀台胞子弟主要的教育機關，也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茲略述各校畢業生狀況如下：

如前所述，一九一九年以前，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是當時兩所台胞的最高學府，若累計兩校的畢業生數，僅得二、一五一人（前者一、六六五人、後者四八六人），只占一九一九年台胞總數的〇・〇六%。時人會將該兩校比作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大學，並謂：

「若論從來本島人確實以此兩校為中心，如各地方現在為社會中堅的人物，有支配社會的勢力，大概都是由這兩校出身的。醫學校是把持台灣醫事衛生的方面，國語學校是把持台灣教育的方面，也有官界和實業界的人很多，至於在社會上，文化的啓發也是以這兩校的畢業生為指導者，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必我喋喋。」（註三〇）

事實上，該兩校出身者亦深以「社會中堅」自豪，例如一九一四年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張耀堂回顧云：

「若作回顧，母校台北師範（案：即原國語學校，一九一九年改制易名）乃台灣學界之先驅。奠定今日我台灣文化之基礎並繼續發揚光大者，正是我台北師範校友。有的是活躍於實業界之新秀，博得上下一致信賴，例如許丙、楊潤波、郭廷俊、陳振能等即是。有的成為地方領導者，膺任庄長，例如林永生、劉軟綱、林蘭芽、潘光楷、許三全等即是。有的成為初等教育界之燈塔，尤其是在人格方面並不比日本人遜色，例如瑪陵坑公學校校長周良、大洲公學校校長甘阿炎、屈尺分校主任廖錫恩、楣子寮公學校校長陳廷鏞、新城公學校校長溫阿青、豐原女子公學校校長陳蔡喜、大茅埔公學校校長朱阿貴等即是。有的成為地方官吏，例如新竹的劉明朝、高雄的劉茂雲等即是。有的成為法界之權威，例如陳增福、蔡式毅、鄭松筠等即是。

……有的擔任中學教師，例如劉克明、張福興、徐向榮及敝人等即是。」（註三一）

一九一七年醫學校畢業的李騰嶽在「台灣初期醫學教育的回顧」一文中亦云：

「本校在當時是本省的最高學府，而其畢業生無論在官公立醫院就職，或從事自己開業，均受社會人士的尊重與成功，所以有子女的家庭，男的都希望去學醫，女的希望嫁與新畢業的醫師。這時候可說是本省學醫者的黃金時代。」（註三二）一九一四年醫學校畢業的杜聰明亦表示，日據時期醫學教育出身的醫師都頗有成就，積聚相當的財富，或被推選為信用組合長（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或被選為州市街協議會議員，甚至被遴選為總督府評議員，例如其本人、張彞生及黃媽典等即是，此外，不少人積極投身於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的政治社會運動（註三三）。總之，正如學者研究指出，醫學校畢業生不只是當醫師，同時是新知識分子，不久亦成為台灣人的政治領導階層（註三四）。

一九一九年以後，隨著學制之改革，醫學校改制為醫專，一九三六年併入台北帝國大學，更是為台胞精英分子所競趨的目標。迨至一九四五年獲台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的台籍人士，計有八九人，均是醫學博士（註三五）。國語學校改制後稱為台北師範學校，另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三年先後增設台南及台中師範學校，據筆者初步探討結果，師範學校亦始終是扮演領導階層搖籃之角色（註三六）。若略作統計，一八九六—一九四二年度，醫學校畢業生計有台籍一、六六一人、日籍五九八人，師範學校畢業生計有台籍七、三一四人、日籍六、七六五人（詳見表一）。

除了上述兩種產生於特殊的教育背景下社會領導階層搖籃外，尚有台北帝國大學及農林、商業、工業等專門學校，亦是當時社會領導階層的重要搖籃。茲略述各校的沿革如下：一九一九年，根據「台灣教育令」，總督府創立專收台胞的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及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以及專收日人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等各一所。一九二二年，修改學制並實施共學後，農林專門學校改稱為高等農林學校，內分農學和林學兩科，一九二八年併入台北帝國大學，成為該校附屬農林專門部，一九三九年，增設農藝化學科，迨至一九四二年，復獨立為台中高等農林學校，翌年，改稱為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其次，一九二六年，停辦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另設台南高等商業學校，惟一九二九年該校併入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旋於翌年停辦，從此遂僅存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一九三六年，增設一年制貿易專修科，一九四一年，又增設東亞經濟專修科，迨至一九四四年，改稱為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復次，一九三一年，有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創立，初設機械工程科、電氣工科及應用化學科等，一九四〇年，增設土木、建築、電氣化學等三科，一九四二年，改稱為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一九二八年，為安插台北高等學校首屆畢業生，乃有台北帝國大學之創立

，初設文政及理農兩部，一九三六年，增設醫學部，迨至一九四二年，理農學部析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更於翌年增設工學部。

據表二、表三的統計顯示，上述各校台、日籍畢業生人數相差懸殊，台籍生平均不及日籍生的四分之一，由此充分反映共學始終徒具虛名。就各校人數觀之，農林專校九九人、商業專校四二五人、工業專校一六二人、台北帝國大學一六一人，不僅人數不足觀，而且係以專科程度者居多數，顯示台籍生必須極其優秀者方足以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就所習學科觀之，呈現極度失衡現象，以習醫者占絕大多數，醫學校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生合計多達一、七四〇人，占受過高等教育者總數的六九%，無怪乎一九四六年李騰嶽在「第一屆醫師節獻詞」中表示：「吾台雖受日治五十一年之壓迫，却能於近世醫學造就相當建設，而醫師之技術素質及數量亦略差強人意。」（註三七）

若累計表一、三，受過高等教育（不含師範學校）的台籍人數共二、五〇八人，若不除去部分死亡人數，只占一九四三年台胞總數六、一三三、八六七人的〇・〇四%，即使加上一直占重要地位的師範畢業生（含國語學校國語部、電信科及農業科等畢業生）七、三一四人，共計九、八二二人，亦只占〇・一六%，與一九一九年相較，實未見顯著的成長。近代歐美國家常以高等教育為「精英教育」，而且受過高等教育者常佔一〇%以上（註三八），足見在殖民統治下台胞的高等教育機會何等不足，受過高等教育者在整個人口中實極其微小，顯然的，總督府的教育乃是將台胞同化在社會金字塔的中下層及底層。

由於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日據時期留學教育呈日漸蓬勃之勢，非但足以補台灣教育之不足，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更是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成員。就留學地區而言，略可分為日本、中國大陸及歐美等三部分，當時留日因在語言、交通及其他因素等方面均較為方便，留學生數遂遠較赴其他地區留學者可觀，影響也較大。

日據不久即有台胞赴日留學，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台北大稻埕牧師周耀彩之子周福全赴日就讀明治學院普通科（註三九）。翌年春，台北富商李春生東遊日本，亦携孫兒延齡、延禧、延昆及親友子弟李解紛、李源頭、陳培炳等六人同行，至日入學（註四〇）。其後，踵繼者不斷，一九〇二年之際，東京地區已有台灣留學生三十餘人（註四一）。據總督府的統計資料（見表四）顯示，一九〇七年以降，台灣留日學生已呈急劇增加的傾向，是年留學生數六三人，較前一年幾乎增加一倍，一九一二年增為二六四人

表一 醫學校及師範學校畢業生狀況表

校別 年度別	醫 學 校			師 範 學 校			校別 年度別	醫 學 校			師 範 學 校			備 註
	台	日	小計	台	日	小計		台	日	小計	台	日	小計	
1896					45	45	1920	48		48	234	45	279	(1)三三人，日籍則專指小、公學師範部及講習科畢業生。 (2)醫學校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北師、中師及南師等，國語學校畢業生中，台籍包括國語部、電信科及農業科等畢業生五。
1897					71	71	1921	35		35	485	85	570	
1898					55	55	1922	40	10	50	548	84	632	
1899				20	64	84	1923	34	17	51	601	105	706	
1900				8	75	83	1924	35	23	58	610	104	714	
1901	3		3	27	10	37	1925	60	24	84	402	114	516	
1902	1		1	146	12	158	1926	54	34	88	128	138	266	
1903	10		10	68	19	87	1927	46	28	74	356	126	482	
1904	9		9	66	19	85	1928	128	45	173	279	157	436	
1905	23		23	92	41	133	1929	118	19	137	155	288	443	
1906	27		27	8	26	34	1930	166	46	212	130	163	293	
1907	23		23	54	27	81	1931	21	44	65	124	227	351	
1908	24		24	65	24	89	1932	27	40	67	130	267	397	
1909	29		29	66	25	91	1933	42	31	73	106	91	197	
1910	32		32	85	45	130	1934	42	28	70	118	239	357	
1911	34		34	79	44	123	1935	37	23	60	100	253	353	
1912	38		38	89	107	196	1936	35	39	74	80	276	356	
1913	31		31	140	79	219	1937	37	35	72	96	263	359	
1914	48		48	141	80	221	1938	38	33	71	67	246	313	
1915	32		32	151	85	236	1939	24	18	42	89	450	539	
1916	41		41	142	68	210	1940	19	17	36	148	503	651	
1917	40		40	183	82	265	1941	17	18	35	242	555	797	
1918	41		41	159	70	229	1942	21	26	47	55	736	791	
1919	51		51	242	77	319	合 計	1,661	598	2,259	7,314	6,765	14,079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明治三六~昭和一二年度；台灣總督府總務局編『台灣總督府第四十一~四十六統計書』昭和一二~一七年度。

表二 各實業專門學校畢業生狀況表

校 項 年 度 別	農林專校			商業專校			工業專校			備註
	台	日	小計	台	日	小計	台	日	小計	
1921				14	22	36				(1) 台籍生含山胞。 (2) 日籍生中不含其他外國人。
1922				11	37	48				
1923				5	43	48				
1924	9	11	20	30	49	79				
1925	23	19	42	21	48	69				
1926	35	23	58	30	56	86				
1927	4	42	46	6	71	77				
1928	2	29	31	38	87	125				
1929	1	34	35	18	104	122				
1930	2	22	24	12	116	128				
1931	0	27	27	3	62	65				
1932	1	36	37	9	57	66				
1933	3	41	44	6	52	58	32	29	61	
1934	1	44	45	5	73	78	25	51	76	
1935	3	35	38	6	70	76	15	50	65	
1936	4	31	35	20	76	96	16	46	62	
1937	2	42	44	14	81	95	9	54	63	
1938	3	43	46	19	76	95	10	52	62	
1939	2	42	44	20	82	102	8	54	62	
1940	2	53	55	18	91	109	9	64	73	
1941	1	69	70	55	108	163	9	66	75	
1942	1	73	74	65	146	211	29	144	173	
合計	99	716	815	425	1,607	2,032	162	610	772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大正一〇～昭和一二年度；台灣總督府總務局編『台灣總督府第四十一～四十六統計書』昭和一二～一七年度。

表三 1930~1943年度台北帝國大學畢業生狀況表

項 別	文 政 學 部										理 農 學 部						醫 學 部		合 計										
	哲學科		史學科		文學科		政學科		小 計		生物科		化學科		農學科		農化科		小 計		醫 學 部		合 計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台	日			
1930	2	1	1				1	9	2	12	14		1		5	3	15		8	3	29	32			5	41	46		
1931	1		6		1	7	2	17	3	31	34				2	10		6	2	17	19			5	48	53			
1932	2	1	3	3	3	3	3	16	7	24	31		4	1	4		17	1	8	2	33	35			9	57	66		
1933	1		2		6	3	10	3	3	19	22	1	4		4	3	14	1	9	5	31	36			8	50	58		
1934			3		3	4	8	4	4	14	18		2		4		11	1	4	1	21	22			5	35	40		
1935					1	4	3	15	4	19	23		1	1	3	3	8	1	4	5	16	21			9	35	44		
1936			2	2	5	6	4	8	8	11	19		1		1	1	5	1	3	2	10	12			10	21	31		
1937	1		1		4	1	8	1	14	15	1		1	2		2	1	6	3	10	13			4	24	28			
1938			1		4	5	9	5	14	19		2	3	1	1	4	1	2	5	10	15			10	24	34			
1939			1		1	2	16	2	18	20			2	1	1	6	3	4	4	12	16	14	23	37	20	53	73		
1940			1		4	4	13	4	19	23			2	1	5		5		7	1	14	15	22	18	40	27	51	78	
1941			3		5		15		23	23		4	1	2	1	9		6	2	21	23	10	25	35	12	69	81		
1942			3		4		3	1	19	1	29	30		3	1	8		24		6	1	41	42	27	12	39	29	82	111
1943			1		3		5	1	21	1	30	31		3		9	1	14		12	1	38	39	6	19	25	8	87	95
合 計	12	2	31	7	54	36	180	45	277	322	2	26	8	47	17	144	10	86	37	303	340	79	97	176	161	677	838		

(1) 1943年度生物科項下係動物學科及地質學科之畢業人數，農學科項下係農學、農業土木及農業經濟學等科之畢業人數。

資料來源：台北帝國大學編『台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一一八年份；台灣總督府總務局編『台灣總督府第三十四~四十六統計書』昭和五~一七年度。

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之變遷

表四 1906~1942年度留日專科以上學生統計表

項 年 度 別	留 學 生 總 數	專科以上學生數					項 年 度 別	留 學 生 總 數	專科以上學生數				
		高 校	專 科	大 學	小 計	百 分 比			高 校	專 科	大 學	小 計	百 分 比
1906	36		13		13	36.1	1925	828	114	123	29	266	32.1
1907	63		7		7	11.1	1926	886	75	153	71	299	33.7
1908	60		8		8	13.3	1927	1,240	147	260	121	528	42.6
1909	96		13		13	13.5	1928	1,405	153	296	121	570	40.6
1910	132		15		15	11.4	1929	1,449	179	251	103	533	36.8
1911	176		18		18	10.2	1930	1,317	170	246	132	548	41.7
1912	264		35		35	13.3	1931	1,501	155	296	148	599	39.9
1913	315		39		39	12.4	1932	1,627	124	330	184	638	39.2
1914	325		45		45	13.8	1933	1,520	105	310	193	608	40.0
1915	327		50		50	15.3	1934	1,977	161	636	197	994	50.3
1916	415		55		55	13.3	1935	2,185	139	691	217	1,047	47.9
1917	482		86		86	17.8	1936	2,357	149	747	205	1,101	46.7
1918	493		102		102	20.7	1937	2,812	154	880	211	1,245	44.3
1919	564		119		119	21.1	1938	4,123	145	1,250	313	1,708	41.4
1920	649		139		139	21.4	1939	5,407	177	1,554	337	2,068	38.2
1921	757		173		173	22.9	1940	6,015	201	1,798	310	2,309	38.4
1922	747	179		4	183	24.5	1941	6,676	249	1,992	303	2,544	38.1
1923	862	73		165	238	27.6	1942	7,091	258	1,939	330	2,527	35.6
1924	850	77		145	222	26.1							
備 註	(1)1921年度以前，僅有高校以上學生總數，1922~1924年度，專科與大學學生數併計。 (2)高校項中含高等學校（大學預備教育）及大學預科。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明治三九年度~昭和一二年度；同前編『台灣學事一覽』昭和二三~一八年度。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起，更是加速增加，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以後，更呈激增之勢，至一九四二年度，遂多達七、〇九一人。惟實際之數恐較上述官方統計高出許多，據總督府另一項調查指出，一九〇八年在東京府管轄內的台灣留學生有六〇人，其後逐年增加，一九一五年，留學生總數已有三〇〇餘人，一九二二年，總數激增至二、四〇〇餘人（註四二）。單是一九二二年已較表四之統計數字多出二倍有餘。另據學者研究指出，日據最後十年，總督府實無法正確掌握台灣留日學生數，當時台灣因人口激增，經濟條件的改善，富豪階層較過去大為增加，因此有能力赴日留學者較諸過去增加數千之多，也因此最後十年實際的留學生數可能較官方統計數多出數千人（註四三）。

台灣留日學生就讀的學校包括小學、中學、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及大專等。雖然一九〇〇年即有楊世英、李傳謨兩人進農科大學（註四四），惟大體而言，一九一八年度以前，留學生中以接受初等及中等教育的占絕大多數，大專以上的留學生平均只占八分之一。該年度開始，大專以上的留學生比率躍升為五分之一。其後，所占比率逐年上升，一九三三年度達於高峯，接受高等教育者竟占半數以上，足見台胞對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與日俱增，同時，亦反映出由於台灣的專科以上學校有限，加以教育機會未能公平開放，許多優秀的學生完成中等教育之後即無法再升學，而在日本則無上述缺失和限制，升學反較容易，故有志之士乃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

就所修習的科系而言，據表五顯示，修習醫、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占多數，尤以習醫者為最，平均占五分之二以上，其次，法科約占五分之一，再其次，商科及經濟科合計亦約占五分之一。由上反映習醫風氣之熾盛，在殖民統治下，自由業是當時的天之驕子，尤其是醫師，最不受總督府的干涉，矢內原忠雄即曾表示台胞中不乏具有開業能力的資本家，加以醫師係自由業，毋須賴政府機關及資本公司之聘雇，尤其是官界及實業界的出路完全為日人所壟斷，乃是驅使台胞知識分子競相習醫的主因（註四五）。加以醫師賺錢較易，收入豐厚，一九〇八年之際，一個開業醫師每月收入少則二、三百日圓，多則達五百日圓左右（註四六）。當時社會一般人對醫師收入無不羨慕異常，有意讓子弟升學之父兄紛紛勸其子弟習醫。此外，當時赴日投考醫專反較在台容易錄取，故富家子弟無不趨之若鶩。赴日習醫者絕大部分就讀醫專，尤以東京醫專及日本醫專兩校人數最多，據表六統計東京地區一九二一—一九二八年間大專畢業的留日學生共三四三人，其中習醫者多達一四四人，而醫專畢業者有一三〇人（註四七）。雖然

表五 1923—1937年度留日專科以上學生科系統計表 1 冊

項 別 年 度 別	學 生 數	文 科		法 科		醫 科		理 科		農 科		工 科		商 科		經 濟		音 樂		美 術		宗 教		家 政		社 會		體 育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1923	165	6	3.6	30	18.3	55	33.4	3	1.8	1	0.6	8	4.8	14	8.5	40	24.2	2	1.2	4	2.4	2	1.2						
1924	145	5	3.4	23	15.9	59	40.7	0		1	0.7	7	4.8	14	9.7	29	20.0	1	0.7	4	2.7	2	1.4						
1925	150	5	3.3	27	18.0	55	36.7	1	1.7	0		14	9.3	17	11.3	22	14.7	1	0.7	6	4.0	2	1.4						
1926	224	11	4.9	52	23.2	82	36.6	2	0.9	1	0.5	17	7.6	20	8.9	29	12.9	2	0.9	6	2.7	2	0.9						
1927	372	17	4.6	89	23.9	137	36.9	4	1.1	5	1.4	21	5.6	29	7.8	54	14.5	2	0.5	6	1.6	6	1.6	2	0.5				
1928	417	18	4.3	101	24.2	161	38.6	5	1.2	5	1.2	29	7.0	26	6.3	58	13.9	1	0.2	5	1.2	4	1.0	3	0.7	1	0.2		
1929	354	18	5.1	81	22.9	144	40.7	4	1.1	6	1.7	22	6.2	24	6.7	42	11.9	1	0.3	5	1.4	2	0.6	3	0.8	2	0.6		
1930	378	24	6.3	79	20.9	136	36.0	5	1.3	9	2.4	23	6.1	32	8.5	59	15.6	2	0.5	7	1.9	2	0.5	0		0			
1931	444	20	4.5	83	18.7	229	51.6	4	0.9	14	3.2	19	4.4	31	7.0	31	7.0	0		7	1.6	4	0.9	2	0.5	0			
1932	514	14	2.7	113	22.0	261	50.8	6	1.2	15	2.9	14	2.7	31	6.0	48	9.3	5	1.0	5	1.0	1	0.2	1	0.2	0			
1933	503	18	3.6	123	24.5	243	48.2	4	0.8	12	2.4	11	2.2	26	5.2	51	10.1	1	0.2	4	0.8	6	1.2	3	0.6	1	0.2		
1934	833	31	3.7	237	28.5	348	41.8	8	1.0	31	3.7	24	2.9	57	6.8	72	8.6	3	0.4	6	0.7	5	0.6	10	1.2	1	0.1		
1935	908	40	4.4	241	26.5	420	46.2	8	0.9	15	1.7	22	2.4	60	6.6	72	7.9	7	0.8	5	0.6	6	0.7	9	1.0	3	0.3		
1936	952	27	2.8	204	21.4	507	53.3	11	1.2	16	1.7	18	1.9	71	7.5	66	6.9	3	0.3	7	0.7	6	0.6	13	1.4			3	0.3
1937	1091	29	2.7	196	18.0	619	56.7	9	0.8	33	3.0	12	1.1	83	7.6	70	6.4	4	0.4	8	0.7	10	0.9	15	1.4			3	0.3

備註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編『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大正一二～昭和一二年度。

表六 1921~1928年東京地區留日大專畢業生狀況表

校別 年別	東京帝大	早稻田大學	明治大學	慶應大學	東京商大	日本大學	中央大學	東京高師	東京高工	青山學院	專修大學	東京美術	東京音樂	法政大學	駒澤大學	東京農大	日本醫專	東京醫專	東京女醫專	日本齒專	東京齒專	東京藥專	慈惠醫大	女子齒專	
一九二一			4	1	1		1			1															
一九二二	2		5	1				1			1							1							
一九二三	3	4	11	2					1		2							1							
一九二四		8	10	2	1		1				1						5	1			1			2	
一九二五	1	4	5	3	5	3	2	2					1				7	2		1	3	1			
一九二六	1	5	5		2	3			2	1	1	1	1				41	2	2		1				
一九二七		5	5	4	3	4	6	1	3	1		4		1				32	2	2	1				
一九二八	4	11	7	1	5	11	14		5					1	1	1		17	1		2	1	3		
合計	11	37	52	14	17	21	24	4	11	3	5	5	2	2	1	1	53	56	5	8	9	2	3	2	

備註：(1) 1921年青山學院項下為明治學院畢業者。

(2) 1926年日本大學項下含齒科畢業生2人。

1928年東京帝大項下含醫科畢業生1人，日本大學項下含齒科畢業生8人。

資料來源：【台灣青年】二卷五號，一九二一年六月二五日；【台灣】，第三年第二號，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台灣民報】，第一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第二卷第七號，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第三卷第十二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九九號，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第一五一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第二〇五號，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

如此，習醫者由於人數最多，故成績亦最突出，據初步統計，日據時期獲得博士學位的留日學生至少有八二人，除葉清耀是法學博士外，其餘的均是醫學博士（註四八）。

修習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亦頗為踴躍，固然與日本政府對留學生的選科並不加干涉或限制有關，實際上乃是反映時代的影響及當時社會的需求。通常法科畢業生最佳出路是進入司法界或政界，是以參加日本國家司法科或行政科高等考試似乎是他們首要的目標，迄至一九二九年為止，司法科高考及格者計有一八人，其中呂阿墉、陳茂源、黃炎生、杜新春、吳文中等分別在東京各地方法院担任司法官，其餘的担任律師，行政科高考及格者有七人，分別出任日本及台灣的官吏（註四九）。商科及經濟科畢業生或創業，或為各企業機關所羅致。值得注意的，上述學有專長的留學生不少人投入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成為反殖民統治運動的中堅（註五〇）。

此外，留日學生或創辦報紙，或倡導新文學、美術、音樂及舞蹈等運動，在近代台灣文化啟蒙運動中扮演著先驅者或核心分子之角色（註五一）。

至於留日大專畢業生總數，由於資料缺乏，不得其詳。據黃朝琴估計，至一九三九年約有五萬人（註五二），此一數目可能偏高許多，僅聊供參考。筆者據表四估計，大約一萬一萬五千人左右。

其次，留學歐美者確數亦不詳，若據一九四一年調查的『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及有關資料略作統計，共有六〇人，其中獲得博士學位者八人、碩士學位者五人，已在日本獲得學士以上學位而再留學歐美者一四人。留學國分別是美國二七人、英國一人、法國九人、德國九人及不詳者四人。所修習科系以醫學最多，有一四人，商業及經濟學其次，有一一人，其餘的分別是神學五人、美術及化學各四人、工科及文哲學各三人、政治二人、史學、法學、社會學、軍事及航海學等各一人，不詳者九人。就其職位觀之，或為開業醫，或担任大學教職，或為企業的主持人，未見有成為殖民政府官吏者（註五三）。

至於返回中國大陸留學者，最初由於總督府頗多限制，故為數不多。一九二〇年代以降，日漸倡成風氣，有志之士多繞道日本，或冒險偷渡而去，絕大多數集中在廈門、廣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之學校，惟人數及就讀之學校一時因資料缺乏，不得其詳。吾人從若干零星記載可推知為數亦不少，例如一九二二年北京有三二人，一九二三年廈門有一九五入，一九二四年上海務

本英語專科學校有五〇餘人（註五四），一九二五年黃埔軍校有五〇餘人（註五五）。當時大多數留學祖國者均投入激進的反日民族運動陣營，他們分別組織北京台灣青年會、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自治協會、平社、台韓同志會、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等團體，策動或聲援島內的政治社會運動，使總督府當局甚感困擾（註五六）。

綜上可知，日據時期留學教育曾塑造了為數相當可觀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以留日學生為主流。他們分別接受不同的專業訓練，成為各種專業人才，彌補台灣教育之不足。儘管學成之後有不少人或回歸中國大陸，或留在日本、美國等留學國就業，然而無可否認的，對台灣社會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精英教育接受者之家庭背景

精英教育所塑造的人才之數量及素質概如上述，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的，乃是接受精英教育者的出身背景，蓋其與此一時期台灣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實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概言之，日據初期總督府對士紳及富豪等台灣社會的中、上階層，係採安撫籠絡的綏靖政策。據藍蘭(Lanier)研究日據初期台灣的士紳，指出雖然一八九五年之後，總督府的許多與革措施不但結束士紳原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並且逐漸破壞士紳的社會影響力和功能，尤有進者，整個士紳集團喪失許多在清代所享有的共同目標和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在綏靖政策的引誘下，許多士紳及富豪旋與總督府妥協、合作，參與地方事務，例如應聘擔任雇員、事務員、教師、保正、街庄長或參事等職務，取得鴉片或官鹽的專賣權，參加官方發起的宴饗或社團，受佩紳章等，不一而足。總之，由於總督府的綏靖政策收到相當效果，大多數士紳均力求適應變局，在殖民政權下扮演新的角色（註五七）。易言之，大部分原屬於社會領導階層的士紳遂得保持其家族地位。另一項研究指出，清代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尤其是所謂的權力家族，實有強烈的維持其地位的趨勢，據統計康雍乾嘉四朝崛起者共有七六家，其中六三三個家族，盛況雖有高下起伏之別，但大致至日據初期均依然高踞社會領導位置（註五八）。

就教育而言，如前所述，儘管日據初期總督府的教育制度頗不完備，然而在行政上却極力爭取各地具有影響力的士紳之支持

早在國語傳習所時代（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即利用地方有力人士協助募集學生（註五九）。一方面順應台灣社會的實際需要，對傳統的書房採溫和的漸禁政策，准許士紳在「關於書房義塾規程」的管理下，繼續開辦書房（註六〇）。另一方面，利用士紳之力成立公學校，並在公學校設漢文科，延聘地方受尊敬的書房教師及學者擔任教席（註六一）。若據『台灣列紳傳』略作統計，公學校成立初期至少有六八名士紳應聘為公學校或國語學校漢文教師（註六二）。同時，總督府極力鼓吹士紳接受新教育，例如一九〇〇年倡組揚文會，然後邀請廩生以上士紳至台北參加成立大會，會中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演說中一再強調新教育的好處，要求士紳破除排斥「新學」的心理，停止支持書房，將最聰明的子弟送到公學校及醫學校就讀（註六三）。要而言之，此即是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對象的教育政策。

上述政策究竟收效如何？亦即是當時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對於新教育究竟抱持何種態度？據載，最初上階層家庭常稱公學校為「番仔學校」，認為課程中除漢文之外，餘均屬「番仔書」，不願其子弟習夷狄之學，故多選擇入書房。至於中、下階層家庭，則以公學校無津貼為由，亦多不願入學（註六四）。然而因科舉之途已絕，加以書房本身固守傳統，設備諸多缺失，課程未必適合新社會需要，因此，不久士紳不得不接受勸誘，順從新教育潮流，執教或讓子弟就讀公學校。一九〇四年以降，公學校入學人數已超過書房，而且逐年增加（註六五）。公學校雖然長期擴充甚緩，不能應學齡兒童入學之需求，惟公學校的開辦及維持常是地方富豪慷慨捐贈的（註六六），同時，絕大部分學生來自富裕家庭（註六七）。由上顯示，總督府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對象的政策獲致相當的成果。

茲進一步分析日據時期兩所最主要的精英教育機關國語學校及醫學校的學生家庭背景。由表七顯示，一九〇五—一九〇八年國語部入學的學生六九人中，家產（含田地、山林等不動產及現金、存款等動產）在一千日圓以上者占四分之三，其中超過一萬日圓的又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師範部入學的學生二〇〇人中，家產一千日圓以上者占五分之四，其中超過一萬日圓的又占總數的五分之一。而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入學的學生四二八人中，幾乎全部家產都在一千日圓以上，其中以一—五萬日圓的最多，占總數的五分之二。據筆者訪問，一九〇〇年代若有家產一千日圓即可稱為小康，有一萬日圓以上者已是屈指可數的地方富豪之流；而一九二〇年之際，隨著經濟發展及物價上漲，有家產二千日圓以上始可稱為小康，有十萬日圓以上可

表七 國語學校(北師)台籍生家產統計表

單位：日圓

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之塑造

部 別	入學 年度	項 別	學 生 數	一 千 以 下		一 — 五 千		五 — 十 萬		一 — 五 萬		五 — 十 萬		十 — 百 萬		百 萬 以 上	
				N	%	N	%	N	%	N	%	N	%	N	%	N	%
國語部	1905-1908		69	16	23.2	22	31.9	7	10.1	16	23.2	5	7.3	3	4.3	-	-
師範部	1905-1909		200	41	20.5	96	48.0	25	12.5	32	16.0	3	1.5	3	1.5	-	-
乙 科	1918-1922		428	7	1.6	89	20.8	94	22.0	185	43.2	37	8.6	14	3.3	2	0.5
備 註	<p>據『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938年，每甲水田平均地價為3,405日圓，旱田為1,513日圓。茲以該年為基數推算，得1907年每甲水田平均地價約為900日圓，旱田約為400日圓，1920年每甲水田平均地價約為2000日圓，旱田約為900日圓，若明細簿中學生家產僅載水、旱田面積者，本表即分別以1907、1920年之平均地價換算為貨幣單位，以便統計。</p>																

資料來源：『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各部生徒明細簿』第1-5、15-18卷。

算是富豪。由此可知，無論是國語部或師範部乙科的台籍生，絕大多數出身中、上階層家庭，甚至不乏富豪子弟。時人更有謂國語部學生家境優於師範部，例如張耀堂回憶云：「當時國語部盡是富豪子弟，而我師範部則是比較不富裕的，正如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一般，總之，經常惡言相向。」（註六八）至於家長職業，都是以地主及自耕農居多數，通常都占四〇～五〇%，其次為商人。概言之，師範生此種家庭背景長期未有多少改變，故迨至日據末期雖然家境富裕程度似稍不如一九二〇年代以前，惟仍舊以中、上家庭子弟為主體，不過此時薪資階級子弟似有增加的傾向（註六九）。

至於醫學校，據表八、表九顯示，農、商子弟經常都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早期中醫師子弟至少占十分之一，蓋未取得「醫生」執照的係被歸為藥材商，尙未計算在內，此一現象反映西醫傳入之初並未受到中醫極端的排斥。另據學籍資料，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畢業生一三八人中，家長為地主（貸地業）者二人，批發及雜貨商二四人，製造業三人，三者合計占三五·五%，以上大致可肯定係家道較殷富者，其餘一時難就記載判斷其經濟狀況或社會地位。惟據筆者訪問，絕大多數學生家庭背景實與國語學校無異，易言之，亦即是大多數均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留學生由於所需的學費、生活費等相當可觀，若非公費或私人資助留學者，通常都是富豪子弟方能如願以償，日據時期留學生家庭背景實以後者占絕大多數。一九二〇年代初期，黃呈聰呼籲總督府根本改革台灣的教育，即曾指出：「若似台灣之教育，要經過一定學問者，尙須負笈遠遊，學資要加數倍，非資產家，則不能矣。多數有向學心之台灣青年，欲留學不能，徒於故鄉長嘆而已矣。」（註七〇）一九〇八年赴日留學的楊肇嘉回憶云：「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為數尙少，而且差不多都是富家子弟。」（註七一）事實正是如此，日據之初，在總督府當局及民間團體台灣協會的慫恿和協助下，富家望族即有遣送子弟直接接受日本國內的教育之傾向，如前所述一八九六年台北富商李春生即親携子弟六人首開留日風氣。一九〇〇年，南部首富高雄和興公司老板陳中和，託其橫濱分公司負責人周端立携其子弟啓貞（十八歲）、啓亨（十八歲）、啓瀛（十七歲）、啓南（十三歲）、有禮（十七歲）、瑞泰（十五歲）、清源（十四歲）、龍門（十六歲）等八人，至日留學，在台灣協會的協助下，商請慶應義塾特為他們開一班級，予以特別指導（註七二）。一九〇四年，陳中和族人啓裕（十五歲）就讀早稻田小學校尋常科，越一年（一九〇五），另一姪啓山（十七歲）入橫濱市立第四小學校一年級（註七三）。至於陳中和其餘諸子啓峯、啓川、啓清、啓安、啓

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之塑造

表八 1900~1910 年度醫學校學生家長職業統計

職業別 年度別	農	商	中醫	教	工	漁	傳教士	公	製造業	雜業	無	合計
1900	14	34	10	4	1	1	3				28	95
1901	22	21	3	1			1	1			16	65
1902	19	20	8	3				1		3	17	71
1903	16	12	5	1	1					1	9	45
1904	6	11	1	1	2		1	1		1	8	32
1905	10	11	1	1	2			1		3	9	38
1906	11	17	2	2				1	1	1	4	39
1907	9	9	7	1			4	1		2	9	42
1908	10	14	5		1		1			2	4	37
1909	17	12	4	3			1			2		39
1910	21	10	6		1		1	3	2	7		51
合計	155	171	52	17	8	1	12	9	3	22	104	554
百分比	28.0	30.9	9.4	3.1	1.4	0.2	2.2	1.6	0.5	4.0	18.7	100.0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三二~四二年度。

表九 1914~1920 年度醫學校學生家長職業統計

職業別 年度別	農	商	中醫	教	工	漁	傳教士	公	製造業	雜業	無	西醫	貸付業	雇傭	合計
1914	22	8	2	1	1			4		2					40
1915	9	7	2		2			2		12	6	1			41
1916	13	7	1	3	1		1	1	2	8	4				41
1917	14	9	2	2				2	3	9		1			42
1918	13	23	4	1	4					1					46
1919	12	9	1		5						2	8	1		38
1920	12	9	2		2			1		1	6		7	1	41
合計	95	72	14	7	15		1	10	5	33	16	4	15	2	289
百分比	32.9	24.9	4.8	2.4	5.2		0.3	3.5	1.7	11.4	5.5	1.5	5.2	0.7	100.0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大正三~九年度。

琛等，莫不先後赴日，完成高等教育（註七四）。

據總督府的調查指出，自一九〇一年前後起，台灣上流階級即紛遣子弟留學日本，人數與年俱增（註七五）。故除上述李、陳兩大家族子弟外，據有關資料顯示，一九〇五—六年，中部實業界巨擘台中街長增生林汝言先後遣送長子澄坡、次子澄瑩等，至日留學（註七六）。一九〇九年之際，東京的留學生中，名重一方的士紳及富豪子弟尚有霧峯林家族人林仲衡、林氏雙隨二人，清水豪族楊家族人楊緒洲、楊緒恭、楊肇嘉等三人，嘉義貢生賴世觀之子賴雨若，台中望族呂汝玉之子呂季園，淡水秀才洪以南之子洪長庚，新竹富商張嘉盛之子張福興等，不勝枚舉（註七七）。霧峯林獻堂先於一九〇六年資助甘得中赴日留學（註七八），一九一〇年親携攀龍（一〇歲）、猶龍（九歲）二子至日入學，又二年，復携雲龍、陸龍二子至日，其族人亦紛紛遣送子女至日求學，故一九二〇年前後，在日本求學的林家子弟人數已達數十人（註七九）。至於板橋林家，亦不例外，早期即有林松壽就讀學習院中學部（註八〇），林熊祥畢業學習院高等科，林履信畢業東京帝大文科（註八一）。以上僅列舉學業大者，其餘不及一一備舉。即使在一九一九年台灣教育令頒布後，富豪子弟逕赴日本或其他地區求學之風氣仍只見增強而未嘗稍減。總督府表示，由於當時台灣的學校除了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按：即中學）較日本國內的男、女中學程度低之外，專科學校只有台北醫學校，其可收容的學生有限，故台灣較重視子弟教育的富豪乃將達到入學年齡的子弟送到日本（註八二）。學者研究指出，當時台灣人的上流階層所要求的是一流的中等及高等教育，而非職業教育，然而總督府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只忠實地反映日本的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欠缺培養年輕人使成爲國家的政、經領導階層之中、高等教育機關，因此台灣的富豪遂不願其子弟就讀殖民地的中、小學，而直接遣送子弟到日本讀小學、中學、專科或大學等（註八三）。總之，無庸置疑的，絕大多數留學生的家境較諸在島內求學者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值得一提的，當時基督教徒，尤其是基督長老教會教徒，對日本新教育的因應和接受遠非一般台胞所能及，例如早期醫學校學生即有不少是傳教士子弟（見表八），據初步統計，一九〇二—一九〇六年六名醫學校畢業生中至少有一〇名是教徒子弟，幾乎占四分之一（註八四）。一九〇〇年，台籍教徒只有九、二八五人，一九一〇年，亦不過二一、七七七人（註八五），在台胞總人口中不及一%，可說是微不足道，因此上述醫學校教徒畢業生所占的比率實頗值重視。其次，如前所述，台胞留學

海外亦以教徒子弟首開其端。考其原因，固有多端，其中教徒子弟較一般同胞先接受西式的新教育，實爲其主因。基督長老教會傳入台灣之初，即藉醫術及教育爲佈教之媒介，除先後設立神學校及小學之外，復應需要，北部教會於一八八四年設立淡水學堂，南部教會則分別於一八八五年及一八八七年，創設長老教中學堂及長老教女子學堂，專收教徒子弟，灌輸宗教課程及西方的新知識（註八六）。因此教徒風氣漸開，對世界大勢較有認識，也因此日據初期教徒對殖民政府所建立的新教育，不像一般同胞對之充滿疑忌或排斥。時人杜聰明回憶指出當時教徒子弟率先入日本學校，甚至負笈留學日本、香港、歐美及中國大陸等地。略謂：

「在日治初期，台灣人不致讀日本書，恐日本人捕捉台灣青年去做兵，但是基督教徒的父兄，多少知道世界的大勢，率先送其子弟入國語傳習所，當時自台灣往日本者，是比今天去美國更困難，但是許多基督教徒青年立志奮發爲第一批留學生，往日本讀書，譬如李延禧、周再賜、林茂生、劉青雲、楊長鯨等是也。」（註八七）。

其次，西洋傳教士的鼓勵和協助亦有莫大的影響，例如一八九七年經牧師甘爲霖與日人交涉後，選派台南訓育學校畢業生郭主恩、蔡溪、陳春等三人，公費赴日留學（註八八）。醫學校成立之初，招生十分困難，總督府即曾託請馬偕牧師等協助招募（註八九）。影響所及，無怪乎一九二〇年代前期，日人今村義夫指出，過去留日學生大半是長老教中學出身的（註九〇）。若略作統計，前述六〇名留學歐美者中，教徒至少有二五人，占五分之一，所占比率之高實足驚人（註九一）。

若就個案觀之，日據時期不少教徒家庭的子女均受過良好的教育，成爲當時社會的中堅分子。例如前引杜聰明文中所提及的李延禧係台北富商李景盛之次子，一八九六年隨祖父李春生赴日留學，畢業於明治學院後，轉赴美遊學，返台後，創設新高銀行，一九二二年繼其父擔任總經理，並曾任總督府評議員（註九二）。周再賜係台北大稻埕牧師周耀彩之次子，一九一五年自日本同志社神學校畢業後，轉赴美留學，一九二一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返日擔任前橋共愛高等女學校校長。其兄周福全早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即赴日就讀明治學院普通科，兩年後返台，一九〇四年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註九三）。林茂生係前清秀才屏東林燕臣牧師的長子，早年即赴日求學，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爲同胞第一位文學士，一九二九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歷任長老教中學教務主任、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及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英德語科主任等（註九四）。另如嘉義人陳老英，隨洋教士習醫後開業，生有二子四女，次子陳宗惠獲慈惠醫科大學博士，孫嘉音、嘉得分別獲愛知醫科大學及台北帝

大醫學博士，一門出三博士，三代皆為名醫。台南人高長，生有五子，長子金聲畢業於台南神學院，任教於長老教中學，次子及三子隨洋教士習醫後開業，四子再祝及五子再福先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又金聲育有六子，其中五子皆成名醫，長子天成獲東京帝大醫學博士，次子永寧畢業於日本大學醫科，三子太平及六子聘明均畢業於昭和醫專，四子上榮畢業於東京醫專。台南人劉瑞山、劉錫五兄弟，為虔誠的教徒，經營雜貨致富，瑞山有四子，長子青雲畢業於慶應大學，次子子安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及倫敦聖經學院，三子子祥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部，四子青和畢業於德國 Technische 大學化學系，錫五育有二子五女，長子清風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醫學博士，次子青黎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化學博士，長女謹治畢業於東京大妻高等技藝學校，次女快治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三女宇治畢業於東京齒科醫專，四女秀津畢業於嶺南大學，五女聰慧獲台北帝大醫學博士。台南善化人顏振聲，隨洋教士習醫後在台南開業，生有六子，長子春芳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次子春安獲美國伊利諾大學化學碩士，三子春和畢業於明治大學法科，四子春輝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五子春霖及六子春聯皆是留日醫師。台南人蔡得一，隨教士習醫後在台南開業，長子愛仁畢業於中國公學商科，次子愛義畢業於大阪醫科大學，三子愛禮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四子愛知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嘉義人蔡超，隨洋教士習醫，長子陽明畢業於名古屋醫科大學，次子陽輝獲慶應大學醫學博士，三子陽昆畢業於慶應大學醫科並留學英國（註九五）。此外，如屏東傳教士彭士藏，其子清約、清靠、清良等三人先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孫輩則均受過高等教育，其中有十餘人是醫師（註九六）。鹿港教徒施瑞呈，係地主，其子江東、江西、江南等三人亦先後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其中江南後獲京都帝大醫學博士（註九七）。餘例尚多，不及一一備舉。由上反映教徒子弟頗富進取心及競爭能力，透過新教育，教徒家庭遂產生極其活潑的上升社會流動。

綜上可知，無論在台接受教育或是留學海外，中、上階層子弟，尤其是富豪及士紳子弟，可說是新教育的重心，此一現象一則顯示總督府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對象的教育政策確實收到相當效果。誠如藍蘭的研究所指出：「當經過若干時間後，士紳接受此一時期的教育變革之傾向，表現在他們的子弟接受學校教育上。全島許多士紳子弟紛紛進入官立或公立學校。有時，富紳子弟亦前往日本升學。送子弟入學接受近代日式教育的，並不限於與殖民政權妥協或適應近代潮流的士紳，甚至連不滿新政權而退隱的士紳有時亦讓子弟入官立或公立學校接受教育。……迨至一九二〇年代，名人錄上顯示許多醫師、律師、教師，甚至（在日本

的)記者、官吏等，都是地方士紳的子弟。」(註九八)一則顯示富豪士紳重視子弟教育之傳統的延續，正如鶴見氏(Tsurumi)所說的，若回顧清代台灣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在中國史上傳統的功能，則台灣人旋即接受日本較高的教育作為改善他們生活狀況的手段，實不足為奇(註九九)。正由於富豪士紳繼續重視子弟教育，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益形鞏固，甚至更加提高。

安德森(Anderson)比較研究一八個國家的大學生出身背景，指出各國的大學生大多數均來自非勞工家庭，白領階級子弟接受大學教育的可能性大約是勞工子弟的五(五〇〇)倍(註一〇〇)。根據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大致可以肯定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產階級子弟接受教育的有利條件逐漸被打破，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工子弟在整個人口中仍然占極小的比率(註一〇一)總之，教育機會平等只是一種規範和理想，中、上階層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實遠大於下階層。由是觀之，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中、上階層子弟為新教育尤其是中等以上教育的主要構成員，並非殖民地的特殊現象，只是在殖民政府的刻意引導下顯得更加突出罷了。

四、社會領導階層學歷背景之變遷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遷，新領導階層將逐漸取代舊領導階層，乃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現象。本節擬從教育背景分析此一時期的台灣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取代大勢。

如前所述，日據初期總督府一方面安撫擁護士紳及富豪等清季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將他們納入殖民官僚體系的基層中，授予他們某些榮譽職銜，或方便他們取得某些新經濟利權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鼓勵士紳及富豪子弟接受其所提供的新式教育，由是清季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子弟成爲此一時期精英教育的主要成員。影響所及，在新、舊社會領導階層遞嬗過程中，並未呈現活潑的上昇社會流動現象，只是舊社會領導階層的子弟以具備專業知識的新角色繼承或取代其父兄的社會地位。同時，因殖民教育制度的特殊性，新社會領導階層的教育資格遂別具特色。茲略作分析如下：

據大園市藏編『台灣人物誌』，被列入當時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台籍人士共三〇二人，其學歷狀況如表十。

由表十可知，一九一〇年代舊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仍占半數，其影響力仍不可忽視。而新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則以醫學校畢業者爲數最多，約占新人的二分之一，蓋醫師爲當時社會的高級新知識分子，加以收入豐厚，由是建立相當重要的社會

表十 1910年代社會領導階層學歷狀況統計表

項別 學歷別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漢學	146	48.3	含有科舉功名者及僅通四書五經者。
公學校	33	10.9	含國語傳習所、公學校速成科。
中學	6	2.0	含神學校及留日中學程度者。
師範	19	6.3	含國語學校各部，其中國語部及電信科畢業者6人，若加上再留學深造者1人，則共有20人，占6.6%。
醫學校	68	22.5	專指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者。
留學	3	1.0	專指大專程度以上的留學生。
不詳	27	9.0	
合計	302	100.0	

資料來源：大園市藏『台灣人物誌』（台北，一九一六）。

表十一 1930年代前期社會領導階層學歷狀況統計表

項別 學歷別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漢學	256	23.9	含有科舉功名者及僅通四書五經者。
公學校	110	10.2	含公學校速成科、補習科及高等科。
中學	74	6.9	含普通中學、職業學校及農事試驗場、工業講習所等。 內含留日中學程度者 16 人。
師範	170	15.9	含國語學校各部，其中國語部畢業者 73 人。 若加上再留學深造者 32 人，則共有 202 人， 占 18.9%。
專科	3	0.3	專指台灣的農林、工業及商業專門學校。
醫學校	143	13.4	專指台灣的總督府醫學校、醫專等。 若加上再留學深造者 32 人，則共有 175 人， 占 16.3%。
留學	179	16.7	專指專科程度以上的留學生。
不詳	136	12.7	
合計	1,071	100.0	

資料來源：林進發『台灣人物評』（台北，一九二九）；大園市藏『現代台灣史』（台北，一九三四）；台灣新民報調查部『台灣人士鑑』（台北，一九三四）。

地位和聲望。至於其他的新教育出身者，大多係富豪，或成功的工商業經營者，或傑出的區長、街庄長等。總之，大多是繼承其父兄原有的地位或基礎，教育資格與其扮演的角色並未密切相關，因此所有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者均非以傑出的教育工作者而列名，至於公學校及中學畢業者，只不過是受過普通教育，更談不上專業訓練。考其成爲社會領導階層的原因，係由於當時這些殖民地「精英教育」出身者的家庭背景及本身能力較爲優越所致。

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由於教育制度較前完備，留學風氣亦相當熾盛，專業教育出身者漸多，因專業成就而成爲各階層代表人物者亦日漸增加。據一九三〇年代前期所編的數種人名錄，被列爲各階層代表人物者共計一、〇七一人，其學歷狀況如表十一。

由表十一可知，舊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仍約占四分之一，足見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取代過程十分緩慢。新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中，以師範及醫學校畢業者，以及專科程度以上的留學生占多數，前兩者合計占三分之一，後者占六分之一，三者合計已約占總數的二分之一。如前所述，師範及醫學校長期係台灣的最高學府，故匯集台胞子弟的精英分子。而這些精英分子在本身條件及家庭背景兩皆優越的情況下，其中許多人不只是一般的專業人員，甚至成爲其專業以外其他部門的佼佼者，誠是此一時期的值得注意的特殊現象。至於專科程度以上的留學生逐漸在社會領導階層中占重要地位，乃是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留學教育蓬勃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殖民地本身高等教育不足所造成的偏頗現象。

若進一步分析一七九名留學出身者所修習之專長，分別是習醫者六四人、習法政者五三人、習經濟者二〇人、習藝術者一二人、習文哲學者六人、習師範者四人，以及習農、工者各一人、不詳者一七人等。明顯的仍以習醫者最多，若加上台灣的醫學校出身者，計有二〇七人，占新社會領導階層的四分之一，顯然的醫師的社會地位始終最受尊崇，儼然是當時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中堅。此時社會領導階層的教育資格與其所扮演角色的相關度雖較前期提高，惟整體而言，仍然偏低。易言之，多數社會領導階層仍未與其專業訓練充分結合。

迨至日據末期，據表十二顯示，舊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只占四·一%，已是無足輕重了。然而新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中，公學校及中學畢業者非但未見減少，反而增加了，一九三〇年代前期兩者合計占一七·一%，此時則提高爲二八%，尤其是中學畢業者比率提高一倍有餘。考其原因，與一九二二年以後中學畢業生不斷增加，而高等教育却未隨之作適當擴充有關，因

表十二 1940年代前期社會領導階層學歷狀況統計表

項別 學歷別	人數	百分比	備註
漢學	64	4.1	
公學校	201	12.9	
中學	235	15.1	內含留日中學程度者 42 人。
師範	219	14.1	內含國語部畢業者 64 人。 若加上再留學深造者 40 人，則共有 259 人，占 16.6%
專科	23	1.5	內含台北帝大畢業者 7 人。
醫學校	248	15.9	若加上再留學深造者 27 人，則共有 275 人，占 17.7%。
留學	377	24.2	
不詳	190	12.2	
合計	1,557	100.0	

資料來源：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台北，一九四三）。

此造成許多優秀的中學畢業生喪失專業精英教育的機會。幸而此時台灣社會專業化程度仍頗為幼稚，故對他們成爲社會領導階層仍未有重大的影響。質言之，家庭背景依舊是成爲社會領導階層的決定性因素。

其次，師範及醫學校畢業者所占的比率未見降低，足證兩校始終是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搖籃。至於台灣其他高等教育機關畢業者，人數仍然不多。可是專科程度以上的留學生所占的比率却大爲提高，由一九三〇年代前期的一六·七%提高爲二四·二%。顯示日據後期留學生在台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此乃殖民地本身教育制度不完備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若分析三十七名留學出身者所修習之專長，分別是習醫者一五七名、習法政者一〇四名、習經濟者六三名、習文哲學者一〇名、習藝術者八名、習工科者九名、習農科者六名、習理科及師範者各一名，以及不詳者一八名，仍以習醫者最多，習法政者其次。

就高等教育出身者的比率觀之，一九三〇年代前期占三〇·四%，此時則提高爲四一·六%，顯示社會領導階層的素質日漸提高。

要而言之，日據時期台灣社會新、舊領導階層的遞嬗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一九二〇年代以後，新教育出身的知識分子始在社會各部門普遍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殖民教育政策及制度特殊的影響，醫學校及師範學校出身者始終是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構成員。其次，由於殖民地本身高等教育設施極爲不足，遂唯有賴留學教育以爲悞注，也因此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日漸成爲社會領導階層的重心。此外，初等及中等教育出身者長期占相當的比率，同時，受過師範及高等教育專業訓練者，絕大多數並未扮演與其教育資格密切相關的角色，而是表現出「通才」的性質，顯示當時台灣社會的專業化程度仍頗爲幼稚。

五、結 論

綜括而言，由總督府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及設施顯示，日據時期培養社會精英的門戶極其狹窄，而且並未公平地開放給每個人，在殖民地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台胞實極其稀少，造成初等及中等普通教育相當於「精英教育」的特殊現象，因此，吾人可以說殖民地本身的教育促進社會成員上昇流動的功能並不顯著。在此一狀況下，留學教育遂擔負起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其所造就的人數，若單獨觀之，似乎還相當可觀，惟在台胞人口總數中仍然是微不足道。據筆者估計，日據全期所有在島內外受過高

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案：含師範畢業者）大約只有三萬人左右，僅占日據末期台胞人口總數的〇·五%，其無足輕重實不待言。其次，總督府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對象的教育政策收到相當效果，清季的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很快地即對新教育產生認同，紛紛送子弟入學、升學，甚至遠渡重洋赴日留學。影響所及，日據時期中、上階層子弟大多接受優於一般民衆的教育，其家族的社會地位及經濟地位遂得繼續維持，甚或更加提高，只是因子弟所受的教育及專業訓練異乎從前，而改變其社會角色和功能罷了。

至於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遞嬗，可說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並未呈現活潑的上昇社會流動現象。只是舊社會領導階層的子弟以受過新教育或具備專業知識的新角色，繼承或取代其父兄的社會地位。然而由於殖民政策導致教育機會的偏頗，受教者鮮有充分選擇的機會，加上受時代潮流及社會價值觀念等之影響，新社會領導階層的教育資格遂呈現集中的現象，而以習醫學、師範、法政及經濟者占多數，尤其是醫師長期擁有最受尊崇的社會地位。另就社會變遷的程度觀之，此一時期台灣社會專業化程度仍頗為幼稚，故社會領導階層仍不免扮演「通才」的角色。其他關於此一時期社會領導階層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部門的實際結構及運作情形，將另文探討，茲不復贅。

註釋

- 註 一· Barber, B., *Social Stratification* (Taipei reprint, 1957), pp. 87-91.
- 註 二· Pareto, Vilfredo. *The Mind of Society* (New York, 1935), p. 353.
- 註 三· Parsons, Talcott.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in Bendix and R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New York, 1966), pp. 240-265.
- 註 四· Field, G. L. and J. Higley. *Elitism* (London, 1980), p. 20.
- 註 五· Dahrendorf, Ral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46; Dahrendorf, Ralf. "Recent Changes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Stephen R. Graubard, ed.,

- A New Europe? (Boston, 1964), p. 306.
- 註 六· Putnam, Robert 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New Jersey, 1976), p. 27.
- 註 七· Keller, Suzanne I., *Beyond the Ruling Class: Strategic Elit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1963), p. 121.
- 註 八· 詳閱李國祁「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文化講座專集之一一九)(台北, 一九七八); 蔡淵潔「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一六八四—一八九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〇)。
- 註 九· 張朋園「近代中國的社會領導階層」(一九七九, 未刊稿)。
- 註 一〇· 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 一九三九)頁二。
- 註 一一· 「無方針主義」一詞, 是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六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學事諮詢會的演說中提出的。見大園市藏「台灣始政四十年史」(台北, 一九三五)頁四八二—四八七。
- 註 一二·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北, 一九二七)頁一三〇。
- 註 一三· 木村匡「台灣的普通教育」『台灣教育會雜誌』第二八號(一九〇四、七、二五)頁一一—一三。
- 註 一四· 持地六三郎「台灣における現行教育制度」『台灣教育會雜誌』第三一號(一九〇四、一〇、二五)頁一一—七。
- 註 一五· 持地六三郎「台灣植民政策」(東京, 一九二二)頁二九九。
- 註 一六· 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誌」(台北, 一九二六)頁四〇六。
- 註 一七· 持地六三郎, 前引書, 頁二九二—三〇〇; 小森德治「明石元二郎」(台北, 一九二八)頁一一—一三三。
- 註 一八· 吉野秀公, 前引書, 頁一五四—一五五。
- 註 一九·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6-47.
- 註 二〇· Ibid., p. 63, p. 244.
- 註 二一·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 一九四六)頁七六、一二三—三三。
- 註 二二· Campbell, William,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1915), pp. 317-318.
- 註 二三· Tsurumi, op. cit., pp. 45-77.
- 註 二四· 弘谷多喜夫· 廣川淑子「日本統治下の台灣・朝鮮における殖民地教育政策の比較史的研究」『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二二號(一九七三)頁二七。

- 註 二五：黃呈聰「台灣教育改造論」『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二一、八）漢文之部，頁五；王敏川「台灣教育問題管見」『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五號（一九二一、一一）漢文之部，頁三二—三三。
- 註 二六：Tsurumi, op. cit., p. 88.
- 註 二七：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北，一九三七）頁六二六。
- 註 二八：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卷（東京，一九六三）頁三四七。
- 註 二九：吳文星「日據時期之台灣師範教育—教學與訓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八期（一九八〇）頁二七四。
- 註 三〇：黃呈聰「關於台北師範休校事件的一考察」『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二六號（一九二四、一二、一一）頁四。
- 註 三一：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誌」頁二四三—二四四。
- 註 三二：李騰嶽「李騰嶽鷺村翁文存」（台北，一九八一）頁二三〇。
- 註 三三：杜聰明「杜聰明回憶錄」（台北，一九七三）頁一一〇。
- 註 三四：弘谷多喜夫，前引文，頁二五。
- 註 三五：據國立台灣大學編「原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受領者名簿」（一九四五）及其他有關資料，查得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者計有盧萬德、陳景崧、羅福嶽（以上一九四二年獲得）、黃文苑（一九四三年獲得）、莊金座、林清安、翁嘉器、李朝欽、張溫流、徐傍興、張克繩、楊東波、洪孔達、沈孝猷、陳石鍊（以上一九四四年獲得）、李達莊、王耀東、翁廷俊、林天佑、謝伯潛、游高岩、陳天機、何開治、邱雲賜、葉炳輝、詹湧泉、許燦煌、林金龍、鍾有成、彭明聰、李鎮源、林茂、廖月兒、王毓麟、陳嘉得、傅藩岳、賴博文、張俊發、鄭培禮、黃登雲、吳家鑄、郭金塔、劉傳來、謝水居、林千種、王經綬、楊李拱屏、鄭宜秋、謝振聲、李永樂、詹益恭、蔡國銘、劉阿樓、許金六、許南陽、林敬邦、方錫玉、廖貴盛、邱林淵、張天縱、張時聰、蔡惠郎、黃文賢、黃共陸、徐淵智、邱水生、蕭雲嶽、余錦泉、張山鐘、王清木、汪啓源、楊維新、傅雄飛、石紋理、劉聰慧、何禮棟、歐陽澄濱、邱仕榮、郭宗煥、張秋厓、李枝盈、葉作舟、邱雲鶴、李俊德、陳萬居、王意誠、林炳坤、簡德旺、鄭傳對（以上一九四五年獲得）等八九人。
- 註 三六：參閱拙稿「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九）。
- 註 三七：李騰嶽，前引書，頁二一五。
- 註 三八：張朋園，前引論文，頁四七。
- 註 三九：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學籍簿」明治三四年度；另見大園市藏「台灣人物誌」（台北，一九一六）頁一四三。

註 四〇：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一八九六）頁一八。

註 四一：『台灣協會會報』第四八號（一九〇二、九）頁六八。

註 四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社會運動史』（原『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東京，原書房重刊，一九七三）頁二四。

註 四三：Tsurumi, op. cit., p. 127.

註 四四：渡部宗助『アジア留學生と日本の大學：高等教育—殖民地・台灣からの留學生の場合—』『月刊アジアの友』第一二四號（一九七四、八）頁九。

註 四五：矢內原忠雄，前引書，頁二九一。

註 四六：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誌』頁四〇七。

註 四七：據資料顯示，留日學生大多集中在東京及京都兩地，尤其是東京地區留學生通常都占7/10~9/10（『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大正十一~昭和十二年度）。

註 四八：獲得醫學博士的留日學生先後有杜聰明（京大、一九二二）、吳場（東大、一九二七）、洪長庚（東大、一九二八）、廖溫仁（京大、一九二八）、廖煥章（京大、一九二九）、陳新彬（東大、一九二九）、劉清井（東大、一九二九）、王祖檀（東大、一九二九）、施江南（京大、一九三〇）、郭東周（慶應、一九三〇）、林澄清（東大、一九三一）、戴神屁（慶應、一九三二）、賴尙和（京大、一九三二）、黃文陶（京大、一九三二）、張乃廣（京大、一九三三）、郭松根（京大、一九三四）、邱賢添（京大、一九三四）、黃演煥（京大、一九三四）、高敬遠（岡山醫大、一九三四）、傅元煊（京大、一九三四）、陳宗惠（慈惠、一九三四）、呂阿昌（京大、一九三五）、陳茂堤（慶應、一九三五）、徐永壽（東大、一九三六）、孟天成（滿州醫大、一九三六）、陳彩龍（慶應、一九三六）、黃朝清（慈惠、一九三六）、巫永昌（名大、一九三七）、陳增全（京大、一九三七）、黃逢時（京大、一九三七）、吳行全（名大、一九三七）、林全忠（京大、一九三七）、邱德金（東大、一九三七）、陳嘉音（名大、一九三七）、張進通（九州大、一九三七）、陳紹禎（東大、一九三七）、賴其祿（京大、一九三八）、邱雲福（九州大、一九三八）、梁宰（九州大、一九三八）、陳鳩水（京大、一九三八）、林長庚（慶應、一九三八）、周百鍊（長崎醫大、一九三八）、王人詰（京大、一九三九）、許世賢（九州大、一九三九）、陳端方（慶應、一九三九）、蔡錫琴（慶應、一九四〇）、韓石泉（熊本醫大、一九四〇）、李騰嶽（京大、一九四〇）、蔡國蘭（一九四〇）、李克承（長崎醫大、一九四一）、謝指南（大阪、一九四一）、劉慶蘭（大阪、一九四一）、黃演煥（大阪、一九四二）、徐千田（九州大、一九四三）、鄭燈

蓋(名大、一九四三)、林阿安(東大、一九四三)、王金茂(慶應、一九四四)、林天賜(京大、一九四四)、黃金江(慈惠醫大、一九四五)、蔡錫均(九州大、一九四五)、林啓宗(九州大、一九四五)、柯丁選(九州大、一九四五)、蔡陽輝(慶應)、林我澤(熊本醫大)、徐俊貴(熊本醫大)、陳藍田(東京醫大)、陳麗水(長崎醫大)、陳麗澤(長崎醫大)、郭春峯(慶應)、曾萬龍(九州大)、黃瑞傳(東大)、魏火曜(東大)、魏炳炎(東大)、蘇珩山(熊本醫大)、張壽年(慈惠醫大)、劉乾元(熊本醫大)、徐堯輝(九州大)、蔡桂林(九州大)、張紹濂、葉猫猫、張豐胤等。以上係據井關九郎監修『學位大系博士錄』(東京、一九三九); 韋子惠『台灣時人志』(台北、一九四七); 『台灣醫學會雜誌』第三七、四三卷(一九三八—一九四四)。

註

四九：司法科高考及格者：一九一八年有葉清耀(明大)，一九二二年有鄭松筠(明大)，一九二三年有蔡式毅(明大)、陳增福(明大)、賴雨若(中大)，一九二八年有呂阿塘(東大)、陳茂源(東大)、王清佐(中大)、蔡先於(明大)、周淵源(國語學校)、黃炎生(京大)、杜新春(京大)，一九二九年有吳文中(中大)、施炳訓(立命館大)、白福順(中大)、饒維岳(京大)、黃濱渥(東北大)、張風謨(中大)。行政科高考及格者，一九二三年有劉明朝(東大)，一九二四年有劉茂雲(商大)，一九二六年有朱昭陽(東大)，一九二七年有周耀星(商大)，一九二八年有黃添祿(慶應)、林德欽(九州大)、劉萬(京大)。見『台灣民報』第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三一九號。

註

五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二三—五八二。

註

五一：參閱陳三郎「日據時期台灣的留日學生」(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一)頁二三—四—二五六。

註

五二：同上論文，頁二六二—二六三。

註

五三：留學歐美者之姓名、留學國及所修習之科系等如下：陳安國(德、工)、陳炳煌(美、商)、陳棋煌(美、商)、陳圻(美、經)、陳約瑟(不詳)、顏水龍(法、美術)、顏春安(美、化)、吳錫源(美、經)、郭媽西(美、神)、郭松根(法、醫)、黃朝琴(美、政)、黃聯鑣(法、史)高敬遠(德、醫)、許武略(法、不詳)、王受祿(德、醫)、李萬居(法、社會)、林德翰(美、醫)、張鴻圖(英、不詳)、蔡陽昆(英、醫)、王通明(德、醫)、羅萬俾(美、政)、李晏(英、醫)、李延禧(美、商)、李延澤(美、經)、李超然(德、工化)、李昆玉(美、經)、林茂生(美、哲)、林柏壽(英、經)、林攀龍(英、法)、林鼎禮(英、經)、廖溫魁(美、哲)、廖溫義(美、化)、劉振芳(美、神)、王祖檀(德、醫)、蔡愛智(美、神)、蔡愛禮(英、醫)、劉子安(英、神)、劉啓祥(法、美術)、劉快治(美、文)、劉明電(英、經)、劉青和(德

- 、化)、劉青藜(美、化)、劉禎祥(德、醫)、蔡竹青(美、經)、蔡炳煌(美、不詳)、蔡兩三(美、不詳)、周再賜(美、神)、陳清汾(法、美術)、杜聰明(美、醫)、楊仲鯨(美、鑛)、楊三郎(法、美術)、楊長庚(不詳)、陳其鴻(不詳)、吳開體(英、不詳)、吳國智(英、航海)、林俊德(不詳)、劉聰慧(美、醫)、黃國書(德、軍)、鍾啓明(美)等。
- 註 五四：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七四、九〇、九四。
- 註 五五：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台北，一九四七)頁一七。
- 註 五六：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六八、一三六、八一三、八七四。
- 註 五七：Lamley, H. J.,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Early Japanese Rule, 1895-1915,"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4), pp. 324-397.
- 註 五八：蔡淵潔，前引論文，頁二〇一。
- 註 五九：弘谷多喜夫，前引文，頁二一。
- 註 六〇：參閱拙文「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十六卷第三期(一九七八、九)頁六三、七一。
- 註 六一：Lamley, H. J., op. cit., pp. 429-435.
- 註 六二：台灣總督府『台灣列紳傳』(台北，一九一六)。
- 註 六三：井出季和太，前引書，頁三五二、三五五；另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三十五年度，附錄。
- 註 六四：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頁二三八。
- 註 六五：參閱拙文「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頁六二、八九。
- 註 六六：吉野秀公，前引書，頁二三六。
- 註 六七：Tsurumi, op. cit., p. 46.
- 註 六八：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編『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誌』頁二四二。
- 註 六九：參閱拙文「日據時期之台灣師範教育之教學與訓育」頁二七九、二八〇。
- 註 七〇：黃呈聰「台灣教育改造論」頁六。
- 註 七一：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一)(台北，一九六八)頁四八。
- 註 七二：『台灣協會會報』第一五號(一九〇〇、一〇)頁五九、六〇；另見渡部宗助，前引文，頁二四，引自『教育時論』第五五八號。
- 註 七三：『台灣協會會報』第九七號(一九〇六、一〇)頁三二、三三。

- 註 七四：參閱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台北，一九四三）。
- 註 七五：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二三。
- 註 七六：『台灣協會會報』第九七號，頁三一～三二。
- 註 七七：『台灣教育會雜誌』第八五號（一九〇九、四）日文部，頁四二～四七，「內地留學の本島人」。
- 註 七八：『台灣協會會報』第九六號（一九〇六、九）頁四五～四六。
- 註 七九：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七四）頁二七～二八、九五。
- 註 八〇：大園市藏『台灣人物誌』頁七三。
- 註 八一：參閱台灣新民報調查部『台灣人士鑑』（台北，一九三四）。
- 註 八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二四。
- 註 八三：Tsurumi, op. cit, p. 90.
- 註 八四：據『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學籍簿』（明治三二～三四年度）、『台灣醫界』、『醫望』等資料，教徒弟及其畢業年度如下：蔡章勝（一九〇二）、蔡章德（一九〇二）、周福全（一九〇四）、林玉書（一九〇五）、周貴卯（一九〇五）、廖煥章（一九〇六）、吳克己（一九〇六）、趙篤生（一九〇六）、蔡章意（一九〇六）、王恩典（一九〇六）等一〇人。
- 註 八五：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前引書，頁一三一四。
- 註 八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台中，一九七一）卷二，宗教篇，頁一三八下～一三九上。
- 註 八七：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第二輯（高雄，一九六四）頁五一～五二。
- 註 八八：『台灣協會會報』第八號（一八九九、五）頁五九～六一。
- 註 八九：李騰嶽，前引書，頁二三〇。
- 註 九〇：今村義夫『今村義夫遺稿集』（台南，一九二六）頁四二二。
- 註 九一：經查有關資料，可斷定係教徒者如下：顏春安、郭媽西、高敬遠、王受祿、蔡陽昆、李延禧、李延澤、李超然、李昆玉、林茂生、廖溫魁、廖溫義、劉振芳、蔡愛智、蔡愛禮、劉子安、劉快治、劉聰慧、劉青和、劉清風、劉青藜、周再賜、杜聰明、張鴻圖、鍾啓明等。
- 註 九二：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頁四三四。
- 註 九三：周福全資料係據『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學籍簿』（明治三四年度）所載。

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領導階層之塑造

- 註 九四：興南新聞社，前引書，頁四六四。
- 註 九五：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第二輯，頁一五二～一五四
- 註 九六：杜聰明「景福會第二十一屆聯合同學會致辭」『台灣醫學會雜誌』第六九卷第七期（一九七〇、七）頁四七～四九。
- 註 九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生徒學籍簿』大正元年～十三年度；另見興南新聞社，前引書，頁一八一。
- 註 九八：Lanley, H. J., op. cit., p. 437.
- 註 九九：Tsurumi, op. cit., p. 77.
- 註 一〇〇：Anderson, C. A. "The Social Statu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ype of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5, (London, 1956), pp. 255, 259.
- 註 一〇一：Putnam, Robert 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New Jersey, 1976), p. 29.
- （本稿會於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在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主辦之「第一屆歷史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與會的專家學者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謹此特申謝忱。）